

# 美国社会转型期中“媒体干预” 的历史解读与启示

## ——反思我国媒体监督模式的转型

甄巍然

**摘要：**“媒体干预”，其实质为主观驱动式媒体监督。美国两次社会转型期中的“揭丑运动”是媒体干预的典范：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纸的揭丑性报道和杂志掀起的“黑幕揭发运动”，护佑美国完成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水门事件”为代表的调查性新闻事业，为内外交困的美国社会注入一股强劲的力量。处于转型期中的美国媒体干预历史启示我们：我国媒体监督模式亟待转型，即由客观培育式向主观驱动式——“媒体干预”转型，以更主动的姿态捍卫媒体监督权，特别是对行政权力和垄断化的商业权力滥用的监督，这将关系到公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个社会转型期的平稳过渡。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媒体干预；媒体监督模式

**作者简介：**甄巍然，女，讲师。（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1) 01-0007-06

19世纪马克思提出“报纸的最大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sup>[1]</sup>马克思的报纸干预思想在信息发达的21世纪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干预运动的媒体不再单纯是纸媒介，也包括了电子媒介和互联网媒介。由此，笔者将其“报纸干预”扩展为“媒体干预”——大众传媒通过信息传播活动对于社会体制及各种社会公共事务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实施过问和参与。

### 一、“媒体干预”的概念界定

媒体监督，从实质来看，是舆论监督的媒体化形式，它以新闻传播、时事评论、调查性报道等方式将公众意见公开传播，在客观上起到监督政府和公共权力的作用。展江教授在谈论媒体监督问题时曾总结媒体监督的形式：一是以客观报道的形式，使权力运作透明化、阳光化，这是一种看似隐性、实则常规的舆论监督形式；二是以特殊的新闻文体和节目类型——调查性报道的形式，深入揭露重要腐败案例和现象；三是以新闻评论的形式，针对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所作的抨击和谴责。<sup>[2]</sup>

第一种形式体现了媒体通过信息传播的方式首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大众传媒最基本和最根本的问题，它从客观上尊重和维护了公众了解社会的权利，同时也给予其形成公共意见的参考，对于公共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也是舆论实施监督的前提条件；第二、第三种形式则更多体现了媒体的主动性——主动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媒体发言），针对公民社会中的重要事件或问题公开而直接表达某种意见（集合性意见或边缘化意见），这是最直接和有效的媒体监督方式，当然也是最考验媒体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方式。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当附加第四种形式——媒体运动，就像诸如格里利《纽约论坛报》在西

进运动中的各种维护公众利益的倡议运动、废奴运动宣传；普利策《世界报》关于自由女神像的募捐活动、救济贫民窟的各种活动等等。媒体需要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改革，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要反映舆论，更要引导舆论，媒体用自身的影响力积极倡导或组织某些社会活动，进而主动监督社会公共权力的合法有效实施。

综合比较媒体监督的四种形式，从监督的方式和效果来分类，第一种形式可以界定为客观培育式媒体监督，即媒体通过自身基本的信息传播功能，客观体现出对舆论形成的培育作用，以及以此产生的社会监督效力；后三种可以界定为主观驱动式媒体监督，即媒体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深入报道或评论某重大事件，对社会体制及各种社会公共事务实施过问和参与，充分体现社会发展中媒体的推动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以社会干预的方式出现，所体现的媒体监督功能又具有明显的舆论驱动价值，笔者将其界定为“媒体干预”——一种主观驱动式媒体监督。

因此，“媒体干预”概念的提出是以媒体监督方式和效果的分类为基础，它包含于媒体监督概念之中，也强调对政府或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功能，但更侧重于媒体自主地参与社会变革，以一种独特社会力量的监督姿态推进社会发展。从这一概念层面出发考查美国的报刊发展史，最能体现媒体干预作用的就是发生在美国两次社会转型期的“揭丑运动”。以此为鉴，对于同样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探讨媒体干预或媒体监督的模式转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美国社会转型期中媒体干预的历史解读

美国社会自18世纪独立战争以来，经历了两次社会转型：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和20世纪60年代由现代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这两次社会转型中，作为上个世纪以前的媒体主角，美国报刊业实施了主动的媒体干预，同时为社会变革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方面，美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遭遇的社会问题、暴露的社会痼疾都集中体现在报刊版面上，更多的美国民众被唤醒，参与到对抗政治腐败的运动中；另一方面，美国精英阶层对于两次社会转型的改革理想、探讨与反思也都在报刊上实现了完美的鸣响，最终掀起了多个领域的立法浪潮。

两次社会转型中媒体干预的浪潮以两次“揭丑运动”为高峰标记在美国新闻史上：20世纪初以杂志为主力军的“黑幕揭发运动”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调查性新闻事业的诞生。一言概之，两次“揭丑运动”不仅完美地践行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与原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期媒体将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最大化呈现，“它在动荡而复杂的社会变革中帮助国人形成共识，为最终完成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调适。”<sup>[3]</sup>

### （一）“黑幕揭发运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媒体干预

“黑幕揭发运动”又称为“扒粪运动”，新闻史学传统的界定是从1902年到1912年，其代表作品是于1903年1月发表于《麦克卢杂志》上的林肯·斯蒂芬斯所撰《城市的耻辱》、艾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雷·斯坦纳德·贝克的《工作的权力》三篇文章。1906年3月，《世界主义者》发表了前纽约《世界报》记者、思想激进的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的文章《参议院的叛国罪》，该文与最初揭露丑闻的报道所不同的是，文中充满了褒贬鲜明的字眼，如“叛国”、“无耻”、“掠夺”、“强盗”等等，还指名道姓地抨击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等多位参议员，直言不讳地称他们是财团的代言人。该文的发表终于激怒了西奥多·罗斯福，他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对专门从事揭丑的记者冠以“扒粪者”（Muckrakers，后通译为“黑幕揭发者”）的称呼，此名源于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罗斯福以此来讽刺和批评黑幕揭发者，称其在生活中拒绝去看一切高尚的东西，老是把眼睛盯在那些可耻的和低劣的东西上。这位著名的改革派总统以“扒粪者”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但并没有扭转新闻界的揭露之风，揭丑者将这一不雅称号作为一种高贵的尊称和一枚光荣

的勋章而欣然接受，这次揭露运动也开始变得“名正言顺”，并在历史上留下华丽的烙印。

然而，需要重申的是广义的美国报刊“揭丑运动”并非仅仅定格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而是伴随在社会转型的整个过程中。美国的南北战争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奴隶制障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剧，美国在高速发展中进入所谓“镀金时代”，这也为后来的社会转型积蓄着经济和文化基础。189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sup>[4]</sup> [而恰恰是在这个分水岭上，美国的新闻业也实现了一种跨越，即早期的廉价报刊逐步成熟，现代化的新式报刊创始、报团零星出现，“‘民主化市场社会’孕育出发达的新闻事业（史称‘新式新闻事业’）”。<sup>[3]</sup>正是“新式新闻事业”拉开了揭露社会弊病、倡导社会运动的序幕。

转型期美国“新式新闻事业”中有两位报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他们都以报纸揭丑，并由此而赢得成功：一个是创立美国第一个报业集团的斯科里普斯，他办报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努力使富有者难于更加富有，使贫穷者易于避免更加贫穷。”<sup>[5]</sup>他的报纸不以煽情主义的报道取胜，而是依靠吸引工人阶级来唤醒他们抗议诸多的社会不公，并经常为民请愿，揭露市政腐败，保护工会、穷人和被欺骗者的权利，积极推动市政改革。另一个则是被誉为美国报刊揭丑第一人的著名报人普利策，他一生成功经营两份报纸：圣路易斯《邮讯报》和纽约《世界报》，前者向社会发出普利策的口号：“开枪，向着社会的丑闻。”后者创刊宣言表达普利策的崇高理念：“它将揭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sup>[6]</sup>该报发起反对美孚石油公司、贝尔电话公司的专利垄断运动；关注当局在征税问题上的腐败，讨伐买卖彩票者和选举中的暗箱操纵者等等，并在社论中提出后来写进美国法律的税收改革十项原则。1907年《邮讯报》发表了普利策退休前重申的办报原则：“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绝不容忍不义或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煽动宣传，绝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和公众的掠夺者，绝不丧失对穷人的同情；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sup>[7]</sup>“目睹了转型期美国社会之黑暗和政治腐败的普利策，在经手《圣路易斯邮讯报》和《纽约世界报》后，便把这两家报纸变成他向‘游手好闲的富人阶层’和‘托拉斯政府’公开宣战的两大炮台，把揭露和鞭笞各种罪恶行为作为报纸的主要职责。”<sup>[8]</sup>

因此就广义的理解，从19世纪末报纸的揭丑到20世纪初的杂志“黑幕揭发”，新闻记者们带领着美国大众发现了社会转型期形形色色的问题：食物掺假、金融和保险公司肆无忌惮的行为、欺诈性的索赔和专卖药中含有有害成分、践踏自然资源、官僚主义、卖淫、政府与黑道勾结、监狱的情况和报纸为广告商支配等等。<sup>[3]</sup>正是由于美国媒体的揭露促使社会猛醒，公共舆论参与政治的监督力量日益强大，一些领域的立法纷纷出台，如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肉食监察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同时，在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等等领域也凸现重大改革，这些改革的推行有效地遏制了政治腐败，最大程度上缓和了转型期所暴露的社会矛盾，使美国民众从心理上减轻了改革的阵痛。

## （二）调查性新闻事业——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媒体干预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暴露或解释社会腐败现象为核心的报道，它试图针对某些个人或组织有意隐瞒事实真相的情况，来利用媒体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进行精密的、深入的采访活动，以便对不正当的行为做出强有力的解释。<sup>[9]</sup>美国新闻史上的调查性报道发端于20世纪初的“黑幕揭发运动”，真正形成于20世纪60、70年代，以《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调查为典型代表。“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大致从1960年代起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sup>[10]</sup>尽管对于后现代社会是否就完全跨越了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现在并没有完全统一的说法，而且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进入的是“后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或者是“第

三次浪潮”也都不一而足，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美国在六七十年代确实开始了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社会转型。

二战后美国社会经历了5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物质财富迅速积累，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虽然从国际形势上看，美国试图在全世界推行它的政治制度，确立经济统治地位，并垄断原子弹以建立军事霸权，但是，繁华背后却隐藏着更多的社会痼疾。于是，60年代之后的美国一下子就陷入到内外交困的动荡时期，人口的增多、贫富差距悬殊、教育不公平、民族歧视、吸毒和性解放、军备竞赛、总统遇刺等等诸多的问题冲击着美国人的生活；加之猪湾事件和越南战争也直接推进了国内的群众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权利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等等交织在一起，宣泄着美国大众的不安全感和愤怒，而越来越混乱的社会局面更加重了美国大众心理上普遍的无所适从感。曾经对政府永远正确的笃信被信任危机、权威衰落所替代，新教伦理、社会理性和主流文化经受着自恋主义和宗教乌托邦主义的侵蚀和颠覆。

从美国传媒发展史的方面来看，20世纪60年代电视在报道肯尼迪遇刺之后，跻身于严肃媒体之列，并最终形成了报刊、广播和电视的三足鼎立。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成为促使媒体更加专业化、更注重打造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同时，社会的动荡凸显了媒体的功能，公众更需要媒体理性、冷静的分析与判断，解释更多的社会问题，满足其知情权并发挥公共舆论的作用，这成为调查性新闻事业形成的外部因素。于是，大众传媒在报道和解释重大事件中变得更为理性、专业、细致和客观，诸如全面报道民权运动，越战、反战运动和五角大楼文件中媒体的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演绎，特别是《华盛顿邮报》主导的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使调查性报道的声望达到顶峰。

相较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揭丑运动，调查性报道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方面的成熟：首先，揭丑运动更倾向于揭示问题和展示丑陋，目的是让蒙蔽和困惑的公众警醒；而调查性报道则除了关注事件的前因后果之外，更倾向于解释事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其次，揭丑运动中的报刊受黄色新闻浪潮的影响，在新闻的客观性方面有些欠缺，如在普利策、赫斯特报纸的揭丑报道中，虽然在抨击社会黑暗、同情劳动人民方面具有突出贡献，但是在其引发黄色新闻浪潮中假新闻的层出不穷和有意煽动公众情绪等问题，却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黑幕揭发运动”中诸如《参议院的叛国罪》等文章，充斥着明显感情色彩和主观判断的词语，这些都是和新闻专业主义相悖的表现。而调查性报道更体现了新闻的原则和媒体的理性，以客观揭示真相为基础，在内容表达上更严格遵从新闻传播的原则，注重媒体的品格。第三，从媒体监督作用来看，揭丑性报道更多在揭露“黑幕”的基础上，极大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促其参与政治事务的监督，而在监督的持久度和深度上却远远比不上调查性报道。因此，“揭丑性报道是调查性报道的胚胎，调查性报道将在揭丑性报道的基础上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不断地改造社会，促使社会前进。”<sup>[11]</sup>

### 三、启示：我国媒体监督模式亟待转型

尽管美国的工业化转型比我国要早很多年，而且我国转型期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不同于美国，但是，回顾美国两次社会转型中的“揭丑运动”，历史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第一，任何国家（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都会不同程度地暴露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问题，社会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发展的。只有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够用更为宽容、平和的心态，去看待我国转型期所呈现的社会矛盾，才能更冷静、理性地去思考如何构建并完善更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第二，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需要负责任的大众媒体，“报刊等新闻媒体具有传播信息、舆论监督、娱乐服务等社会功能，特别是舆论监督具有社会调整功能，表现为对社会心态、社会意见的调节、疏导和重新整合，还常常表现为充当社会公众的‘传声筒’和‘排气阀’，传达呼声，宣泄积郁，

平衡心理，满足愿望，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心态上维持在一个理想的‘安全值’上。”<sup>[12]</sup>由此看来，无论从政府管理、协调社会矛盾的角度，还是从公民积极参与、舆论监督社会良性运作的角度，媒体干预（疏导、监督与预警）无疑是社会平稳转型的护佑。

### （一）影响和制约媒体干预的要素分析

媒体是否将媒体干预作为自身的社会责任，体现了一个媒体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主要源于传媒资本拥有者的新闻理念，这是影响和制约媒体干预的内部原因；除此之外，不容忽视的是，媒体能否进行积极主动的监督则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国家的传媒政策、法律和文化传统，就不再仅仅是媒体自身的问题了，笔者将其归纳为影响和制约媒体干预的外部因素。

从传媒领域内部因素分析，影响和制约媒体干预的因素主要包括媒体经营者的媒体观、从业人员的新闻素质、传媒组织文化和传媒市场环境等。传媒拥有者的新闻理念具有首要的决定作用。被誉为美国“时代记录者”的《纽约时报》就一直遵循着奥克斯的办报理念——“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成为家族几代人经营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的原则和底线。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是实现媒体干预的重要基础，也是能否有效实施媒体监督的重要保障。以上两点其实都包括在传媒组织文化当中，现代传媒组织都注重打造自身的文化形象，实施品牌经营，这一方面体现了媒体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更能在媒体竞争中取胜。由此看出，传媒市场环境又将其含纳，“美国国内一些尖锐的批评者认为，调查性报道现在成了媒介自塑公众形象，赢得支持率的一个有效手段。”<sup>[13]</sup>传媒市场环境的良性、健康发展无疑是既有利于媒体又有利于社会的，传媒健康有序的竞争环境是以实现市场主体（媒体）与市场消费者（受众）双赢为宗旨的，因此维护公众利益、为民请愿自然成为媒体赢得市场的手段。

从传媒领域外部因素分析，影响和制约媒体干预的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媒体管理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和民族文化特点等等。首要是政治因素，国家制定的传媒管理制度、政府的媒体观和政治体制对新闻自由的吸纳程度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媒体实施干预。我国政府近年来出台的信息公开条例，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日渐开放的媒体观。同时，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舆论与政治交织辉映，依然显露自由媒体与公民意见相结合的巨大监督力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色也影响媒体发挥其作用力。21世纪的中华民族在很多方面更加自省、包容，能够用冷静的态度寻求理性的方法，尤其是全民的媒介素养正在逐步提高，这将是建设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石。

### （二）媒体监督模式的转型——从客观培育式到主观驱动式

新闻传播活动就其社会作用来看，通常主要实现两种看似相对立实则相一致的功能，一种是保持社会平衡状态，一种是打破社会平衡状态，前者是具有宣传的意味，通过有效引导舆论的方式维护社会稳定；后者则具有监督的效力，通过揭示潜在问题预警未来，促进社会进步。尤其是在社会已经出现不平衡状态的时候，更需要媒体勇敢地果决地主动参与社会事务，主动捍卫和有效行使媒体的监督权力，以“媒体干预”思想构建健康的舆论监督环境。

无论何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大众传媒的基本作用就是传播信息，信息的获得对于受众来说是其意见产生的来源，而意见又是舆论形成的基础，因此，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功能就是社会舆论形成的必然保障，这一过程同时又是大众传媒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公众知情权的满足也恰恰能够对社会公职部门或公共事务起到监督的作用，而这也正是一种客观培育式媒体监督。但在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只保持客观培育式媒体监督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矛盾的高度和集中和激化要求大众媒体必须要充当社会情绪的解压阀和宣泄场。通过剖析或曝光社会问题，媒体能够以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打破社会表象平衡或旧式平衡的方式，推进整个社会实现较为理想的无痛分娩，平稳渡过社会转型期。从这个角度分析，媒体监督职责也必须开始自身的转型过程，积极创新有效的媒体监督模式，从客观影响过渡到主观推动，从培育社会舆论过渡到驱动公众认知。媒体要以独特社会

力量的姿态介入公共事务,关键在于能够揭露社会弊病和倡导社会运动,既是否定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又是创造理想社会的倡导者,并能够将这一思想内化为媒体的价值观,与现有商业运作模式实现有效融合。

应当说,传媒的市场化要求媒体必须遵循新闻原则和市场规律,满足市场需求并打造良好形象。以媒体监督反对政治腐败、维护公众利益也是赢得媒体公信力的重要砝码。因此,媒体监督可谓是最低成本的反腐手段,“媒体干预”的有效开展也是抑制腐败、促进官民互信的有效途径。当然,媒体实施监督或媒体干预的实践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能够在利用和协调各种因素的作用中进行有效的媒体干预,对于我国的传媒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总体来说,整个中国社会都需要接受舆论监督的洗礼,需要为媒体营造健康的环境,即尊重媒体存在与运作的规律。而“媒体干预”思想的提出旨在重申一种共识,即“监督权贵、为民请命、捍卫社会公正从来都是媒体值得追求的目标;一个有公信力的新闻界承载着整个社会、尤其是可能被权力侵害的弱势群体的高度期待。”<sup>[2]</sup>同时,我国的大众传媒应当契合社会转型期的需求,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权力监督,特别是对行政权力和垄断化的商业权力滥用的监督,聚合媒体力量推进民主和社会进程,这将关系到公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个社会转型期的平稳过渡。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5.
- [2]展江.舆论监督与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EB/OL].<http://www.fon.org.cn/content.php?aid=12734>.
- [3]展江.社会转型的护佑——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百年祭[EB/OL].<http://www.studa.net/xinwen/060325/17215628.html>.
- [4][美]H.S.康马杰.美国精神[M].南木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63.
- [5][美]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罗伯茨·南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M].展江,殷文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246.
- [6]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93.
- [7]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269.
- [8]冯广圣,杨和平.从“黑幕揭发”看转型期美国报刊的社会功能[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6(4):29.
- [9]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153.
- [10]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8.
- [11]熊玮.从“扒粪运动”到“水门事件”——论调查性报道在美国的兴起[J].滁州学院学报,2008(5):110.
- [12]冯广圣,杨和平.从“黑幕揭发”看转型期美国报刊的社会功能[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6(4):30.
- [13]姜江.无形之网:美国调查性报道的制约性因素简析[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91.